

Peter Burke 和文化史的歷史

自廿世紀七零年代到本世紀之初，文化史是史學轉變的核心。傳統聚焦於政治史、經濟史、宗教史和觀念史的情況，已經被新的主題、新的史料取代，而顯得邊緣化。這些新興主題從書和閱讀的歷史、收藏史、食物史、消費與禮物的歷史，到性的歷史、犯罪史、旅遊史、醫藥史、植物史等。這個領域的延展很明顯擴及學術界與庶民生活的範圍。然而，文化史的核心遠超過上述意象模糊的主題，而以附著於我們所熟悉的傳統政經領域的方式蓬勃發展，一般而言，它瀰漫在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社會史當中。文化史同時也居於傳統分離學科聚合跨界的核心理位置，有時試著發展出對話，即便大部分時候顯得笨拙。這些包括人類學、藝術史、文學史、哲學史和科學史。以此種方式，文化史提供各種不同興趣偏好和研究法聚合一處。

因為文化一詞的廣義定義含括陽春白雪、菁英庶民和生活百態，也因此，文化史提供重新檢視我們對於人類過去生活的各種面貌如何與其他領域相連的認知。我們也可以說，因為文化史涉及實踐與表徵，它居於歷史媒介事件的核心。”新文化史”駁斥廿世紀前期將文化從過去生活撕開，分離成獨立絕緣的一層，像是在政經社會基礎結構上疊床架屋的加蓋屋。因此，我們以廣義定義新文化史為史學的反骨派，受到一九八零年代歷史人類學試圖從不同面向(表徵、儀式、論述、價值)瞭解文化的影響，新文化史透過歷史學的近系學科(社會史和政治史)，產生迥異於傳統關注”高文化”、藝術、文學和哲學的脈絡。

當然文化史並不是過去卅年才被發展出來，然而，它近年崛起廣受矚目也確其來有自。Peter Burke 是這轉變的核心人物。他的許多著作處理各式不同的主題，像是文藝復興史學、圖像和宣傳、流行文化、語言、溝通和翻譯、文化混融。這些著作極為廣泛地探索近代歐洲各式各樣文化的歷史。它不僅是這些領域的先驅，也拓展了文化史的舊邊界，同時平行地發展出這個學科的理論面向。

容許這個學科主題散漫，恐導致文化史有核心模糊、定義薄弱的危機。事實上歷史學者趨之若鶩從各種角度投身其中並不盡然是好事，特別是當新的界線不斷被重新改寫。到底甚麼是文化史?在「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書第二版前言中，Peter Burke 說

文化歷史學者可能不以特定領域像是藝術、文學和音樂來定義他們自己，而慧眼獨具地以價值和符號作為定義，無論它們從哪裡冒出來，從庶民的日常生活或是菁英份子的特別表現。

當文化史探索的主題五花八門，這也是 Burke 的學術特徵，著眼於價值和符號形

成了將散漫主題整合為一的雙股線。然而這也遺有潛在的問題，這點 Burke 也多次提到。Jacob Burckhardt 和 Johan Huizinga 強調掌握過去時代的精神，即每一個特定時期、社會的獨特樣貌，但是它們也被認為在選材上獨斷且詮釋主觀。這樣的批評可以靠系統性選擇材料和謹慎處理文本來修正。受 Huizinga 影響的獨立學者 Aby Warburg 就用他一份研究歐洲古典傳統遷移的論文指出，以修辭模式和心智基模可以處理潛在問題。這個策略之後得到如 Erwin Panofsky 和 Ernst Gombrich 等學者的修正，這些學者多與 Warburg 學會有互動或有關聯。納粹時期 Warburg 學會轉移至倫敦，該學會至今仍為藝術史學者和哲學史學者的互動平台，同時為研習歐洲古典傳統之延續與轉型提供資源。

修辭模式和心智基模之間的真正關係並非總是清楚明白，歷史學者使用基模有時候會試圖假設藝術或文學的表徵總與心理知覺一致。不過，Warburg 傳統聚焦於潛在假設和心理習慣，十分有助於有紀律地運用資源於“主觀之歷史化”(historicization of the subjective)。也就是說，它要求對於心理覺知和對知識的追求產生反思。Peter Burke 關於文藝復興關鍵文本的感知研究，可被視為運用這個想法的其一例證，對於歷史學者來說，受眾反應的重要性不亞於作者的意圖。了解這個過程，需要超越單單只是影響力這個想法(諸如，Castiglione 強烈受到柏拉圖的影響採用它的對話形式)。挑戰實為去找出特定文化藏在解釋、模仿、批評和改編等種種行為背後的符碼。

德國文化史的傳統由 Burckhardt 建立發展基礎(廿世紀北美許多研究文化史的歷史學者都受到德國的薰陶)，然而對於這偉大的傳統最普遍而有力的批評，在於其黑格爾式的假定，表述為*時代精神*這個概念，其為一唯心主義。採馬克思觀點的文化歷史學者，強調人民而非菁英，著眼意識形態而非形式，聚焦社會衝突而非凝聚共識或文化單一性。

當概略形式馬克思主義下的文化相對於被經濟條件宰制的社會衝突，受 Gramsci 影響的一些深謀遠慮的歷史學者，處理文化的方式是視之為社會改革的媒介，強調社會的下層結構。尚有一些學者將廿世紀文化史轉向社會，簡要歸因於馬克思式的批判，部分學者則認為也受到唯心主義的傳統影響。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 1939 年的著作 *Civilizing Process* 是近代早期文化史的關鍵論文。同一時間法國年鑑學派，長期發展其關注的焦點之群體心智與社會想像，而不稱此為文化史，也挹注大量精細的研究成果。Peter Burke 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在這些不同的傳統之間創造了溝通的通道。透過廣泛援引多元材料與研究方法(歸功於對歐洲語言的高度掌握能力)，以及獨特非凡的優雅整合能力，他成功地將德式命題與法式堅持匯聚成廣博的學術領域。

“即便文化史沒有其本質，但它本身卻有其歷史”。這番話或許乍看像是他的史學

折衷主義，也確是由一個特別的關聯——對文藝復興的興趣，特別是“對過去時代之文藝復興式的興味”——成爲他事業的開端。在他一篇寫於 1968 年，後又於 1994 年、2001 年改寫的文章中，Burke 指出人道主義文人筆下出現時代錯置的情況，象徵與中世紀廣爲流佈的態度的斷裂。這點與 Jacob Burckhardt 看法一致，文藝復興時期有某種程度的現代性。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 Burckhardt 對文藝復興的詮釋，是如此地認定爲一個個人主義、勵新圖治和現代性的時代。我們愈是想從過去久遠的時代甚至上溯十二世紀來找尋這個歐洲歷史遙遠的起因，反而這個一觸即發的文化變革是在十五、十六世紀學者與藝術家身上湧現。實際上，Burke 因其對於文化史之歷史的精細知識，發展出對於連貫性之細緻的鑑賞力，以及人道主義觀點下的歷史和西方史學進化過程的斷裂。譬如說，人道主義者抱持古典史觀，強調主體的尊嚴與修辭的力量；然而植根於日常生活的歷史完全反其道而行，反而是透過古玩的研究(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這些關於遺跡、古幣、勳章、落款題字的研究，相較於政治與宗教歷史的大論述都顯微不足道，就像是附著於批判性編年史的補述而已。但是古典形式的歷史人類學、地理誌、自然史都刺激了更爲有企圖心的探索，其間類文化史——現在我們會稱之爲文明史或“生活方式”——就產生了。

歷史人類學

Burke 對人類學著迷起因甚早，他自陳對於文化差異的覺知始於自己的家庭。身爲其父英格蘭出生愛爾蘭裔之子，外祖父母爲猶太裔，他早就覺得“過一個廳堂就像進入另一個文化”。畢業後在新加坡服役兩年，期間勤寫日記不輟，是他的田野調查記錄。1950 年代在牛津學習，課程中盡是政治學，不過他卻也初識許多英國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之後在 Sussex 大學任教期間(1962-1979)，該校屬當時英倫跨領域學術研究環境最盛的校園之一，社會學是幾乎所有學科的共同基礎。

受惠於這個豐富的环境，他養成兩個日後在其著作中始終展現的心智習慣。其一是自我覺察於己身與他者的文化，隨即能發掘兩者文化相異卻功能相近之處。其二是熱衷置身於最前衛的跨領域趨勢中。跨坐在主題與研究法的中線上，是 Burke 的樂趣，也是學術承諾。

Burke 的第一本書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1969) 呈現史學的社會學，其中還比較了歐洲和中國史家，並做出結論。其後出版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972)[之後又擴充爲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naissance Ital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再次展現跨學科的取徑。1980 年代 Burke 出版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這是一本關於社會學與歷史相互貢獻的調查。他邀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攜手合作，它以宣言的方式寫成，後改寫爲教科書，至今仍提供跨學科的對話，並提供研究問題的理論支撐。1970、1980 年代歷史人類學

位居歐洲史詮釋的卓越取向，Burke 適躬逢其盛。他早期對歷史人類學的貢獻為一篇關於“夢的社會歷史”，刊載於 1973 年的法國年鑑期刊。Burke 辯證，為研究夢，歷史學者可以從人類學者如 P.Radin 和 R.G.d'Andrade 等人的理論架構，學到比佛洛伊德和榮格等心理學者身上更多。1978 年 Burke 出版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一書，此為第一本有系統地調查歐洲音階的著作。這本書採用跨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如民謠研究、文學、藝術史、社會學以及人類學。後者正應了這本書對於文化的定義“有系統地分享意義、態度和價值和符號形式(展演方式、藝術作品)，透過這些，文化得以彰顯、確立”。

Burke 的主要貢獻可歸結為幾點。第一，他不僅在學科之間架起橋梁，也系統地探索裡架架構和操作架構，以便成熟的跨學科研究得以實踐。其二，令人驚異的不僅是他運用理論文獻的數量，而是這些文獻的殊異性。Burke 的折衷主義表現出他有意識地是自己為有創意的借用者—a bricoleur。此外，它成功地把人類學從歷史研究的邊緣推向中心。同時，他也不認為人類學的理論架構僅適用於研究社會貧苦或受忽視的成員，他多次證明人類學的理論架構同樣適用於研究菁英分子的文化。

政治與溝通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 一書的副標題是“感知與溝通”，這些是 Burke 長期的研究興趣。Burke 的研究處理溝通歷史有三個起因。首先，七零年代他進行了語言歷史與語言社會學的歷史研究，1987 年他與 Roy Porter 共同主編語言社會史。學術活動之外，他更個人化的動機是源於其父為專業翻譯以及他自己是會說多達十案種歐洲語言的語言學家。無怪乎他因此發展出翻譯史和語言借用的歷史研究。

其二，Burke 始終強調溝通是一個社會宰制的形式，可以主動對社會階級塑型。這是足以說明他研究溝通歷史的第二層觀點，關注於溝通與權力的關係。他也援引傅柯和 Karl Deutsch 的古典研究，關於宗耀機構和世俗機構的做決定歷程中，分析蒐集來的資訊的重要性。

再者，是其對溝通歷史與知識流佈的關注。千禧年之後 Burke 展開兩個大型研究，一是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另一是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在此領域中，Burke 有幾項卓越的貢獻。他雖開玩笑地說語言史太重要所以不能只留給語言學家做，這也被視為邀請歷史學者與語言學家攜手對話的宣言。此外，他不斷強調不同媒體之間的系統性溝通，因為當代視媒體為一個整全的合體，而非一個一個的部分媒介。

Burke 對溝通的獨到見解源自於人類學滋養，像是他以歷史學者口吻討論儀式作

為溝通的功能。最後他也強調感知與溝通一樣重要，據此，他所以認為應該討論創作者為何以及如何鎖定一群特定的閱眾。以往溝通歷史太過偏重社會中的衝突元素，Burke 試著重新調整這其中的平衡。

圖像

Peter Burke 的著作中主要的軸線之一是，他強調在任何社會中作為政治和社會趨力的代表性的力量，不論其存在的形式為視覺、物質或文學的。他特別對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中的代表性有高度興趣，他著眼於訊息再製的創造與接收的複雜性，接收與製造並不是單純一個方向的過程。在他事業發展一開始，他就明白有必要運用在文本中無法發現的各種視覺代表性揭露早期現代生活的各種細節，更是用此法去揭露社會中的各種動力。這個學術性去的高峰彙集在他 2001 年以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著作 *Eyewitnessing* 當中。這本書擷取跨歷史和研究法的文章，其主題有關全球自古至今的視覺和物質文化，形成一個整全觀察。

在 *Eyewitnessing* 一書的前言當中，Burke 解釋為什麼歷史學者花了這麼久的時間才連結到視覺材料，他引用 Raphael Samuel 的話，成長於 1940 年代的歷史學家是一整個視覺文盲的世代，因為他們的時代沒有電視，學校教科書的文字量遠超過圖片。Burke 自己很小的時候就去倫敦國家藝廊參觀，在那看過名作，他對電影也非常有興趣。毫無疑問地，要是 Burke 沒有對圖像這般高度的興趣，他不可能做到他所擁有的。

像 Burckhardt 等人一樣，Burke 注意文化菁英的藝術作品。他的社會學取徑探討藝術品的創作，也有助於重建這些藝術品被文藝復興佛羅倫斯和威尼斯的社會菁英接受的實況，不過理論架構與 Burckhardt 的手法，和對 1860 年前後古典傳統有興趣的學者做法十分接近。之後出版於 1978 年，一本有關以義大利文藝復興流行文化為軸的書，終篇以尼德蘭與日本的比較作結，這樣的比較跨越時間和空間，是 Burke 學術研究的特徵，也是他對於歐洲以外世界的無限好奇心擴張的結果。比較的手法肯定是 Burckhardt 不會嘗試的。

Burke 追求“全歷史”，因此他追求超越肖像圖像，不以用錯綜複雜的古典傳統知識解釋菁英文化圖像的意義，而以更廣泛的社會文本尋找其他的意義可能性。他與學者的友誼與學術合作激發他對“視覺溝通”的興趣，結果影響了他對代表性和實踐的發現，寫成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該書被視為圖像文化史研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Burke 晚期有關研究象徵與代表性的著作，持續表現出結合所有的媒體和物質文化的高度興趣，範圍廣泛從當代木雕到義大利寫實電影。

象徵與代表性和實踐之間的張力位居 Burke 研究的核心，同時圖像也被用來創造

早期現代社會整全面貌。然而 Burke 的研究從來不是維持不動的，像是他把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圖像研究放在社會脈絡中，卻把另一篇動畫研究只看其影像本身，對其社會和政治潛在影響輕描淡寫帶過。

許多視覺文化的研究都宣稱以 Burke 的圖像文化史為依從，他們與社會學的歷史傳統，意即從 Burckhardt 到年鑑學派，或與 Burke 自己的作品，都相去甚遠。兩個視覺文化研究的著作被視為此研究典範系譜中的核心代表：M. Baxandall 的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 (1972) 和 S. Alpers 的 *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83)。前者和 Burke 的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naissance Italy* 出版於同一年，兩者都表示他們分享共同的學術架構，但各有其不同學科下的拋物線。相反地，Burke 以懷疑口吻看待 Alpers 的研究。Burke 特別是對 Alpers 把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視覺文化看做“narrative”，把十七世紀荷蘭視覺文化看作“descriptive”、用成襯托。這些對立的看法，也是 Burke 雄辯滔滔的起因。Burke 與許多不同學科不同國籍的學者，以及當代各種理論與社會互動，正如他 2009 年的著作 *Cultural Hybridity* 所呈現的面貌。但是 Burke 對新理論架構的開放性，並未讓他放棄把圖像放在歷史的與社會的脈絡中來研究。

遇見文化

源於 1992 年的懷舊風，或也因為長期以來對於全球歷史的風潮，文化邂逅的歷史研究(包括旅遊史、旅遊文學史、“他者”的感知、殖民脈絡下的多民族互動、翻譯和世界史之歷史等)躍身為這個主題的主要領域。自從九零年代起，Burke 穩定地寫作關於這些主題的研究，其中還包括一本有關文化混融的小書。

自此一脈絡下，Burke 的貢獻之一是他強調開闊的比較觀點的價值。即便歐洲文藝復興，也值得以“新生、復興”的概念來看其他的文明，像是日本元祿時代 (1688–1704)。雖然這類型系統化的比較，留待未來的實徵研究，Burke 提供一個有趣的平行研究例子，將黃金時期(the Golden Age)的概念之於鄂圖曼和歐洲文化。

另一方面他思及古典命題有關新世界之於舊世界的影響，九零年代 Burke 支持早已由 John Elliot 和 David B. Quinn 倡議的微型命題。此外，他注意到文化流佈現象也是其對文化邂逅歷史研究卓越的貢獻之一，一是文化他者的代表性，另一是創造了不同傳統之間的互動。至於文化實踐，Burke 提出獨立分流文化傳統之間的對立命題，一方面強調人類強大的文化混融能量，另一方面指出是經濟條件使得混合與融合得以有存在可能。

Burke 在 2003 年版的著作 *Cultural Hybridity* 當中，他很清楚地陳述自己的文化

混融經驗都十分正向，並指出文化邂逅有助於鼓勵創造力，也有助於後現代情境中獨立文化不復存在的情況。然而，他也在研究中坦言文化混融倒也不是完全沒有輸家，而且也的確常伴隨負面的國族主義與排外憎惡他族的行為反應。文化遭逢的前線無疑是迷人的，但也是政治角力、社會邊緣化與站立界線上無所適從的個體和具有多元認同的人匯聚之處。當觸及文化混融，**Burke** 將歷史學者的身分先放置一邊，改以全球公民的口吻看待未來。於此，他看到一個混融而非一個同質化的未來，一個主體與客體混合(指歐洲語和殖民地語的混合)而非西方文化優位的壓制式世界。本文試圖以巴西而非英國的觀點作出結語，正如 **Burke** 對巴西的興趣，從嘉年華到一個馬拉尼昂州僅三萬人的市鎮，是一個個人鮮明的多年文化邂逅經驗。